

元典文化丛书

人伦本原

《孝经》与中国文化

臧知非 著



李振宏 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B823.1/6

2005

人伦本原

——《孝经》与中国文化

臧知非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臧知非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8

(元典文化丛书/李振宏主编)

ISBN 7-81091-217-8

I. 人… II. 臧… III. 孝经-研究 IV. 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2716 号

书 名 人伦本原——《孝经》与中国文化
作 者 臧知非

责任编辑 西 伯
责任印制 苗 卉
版式设计 冯爱莲

责任校对 冯爱莲 艾 华
装帧设计 刘广祥
封底篆刻 闻 道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行管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E-mail:bangong@hupress.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44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81091-217-8/K·380

定 价 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为“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家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展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

“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所年,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两千年多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

前提,同时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意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惟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惟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传统文化,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传统文化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意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

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意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入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部分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从一个新的基点上重新认识古代典籍的文化价值。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自

己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的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本丛书的撰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工作。但为了使它能拥有更广泛的读者,我们对作者提出了思辨性与通俗性、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统一的要求;并力求在编写体例上、文风上照顾普通读者的需求,对一些艰涩的引文尽可能加以译述,或直接译为白话文加以征引。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候,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社会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一 《孝经》的成书与思想内容	(1)
1. 《孝经》作者与成书时间	(2)
2. 先秦儒家孝道理论与《孝经》思想来源	(11)
(1) 孝的含义与起源	(11)
(2) 孔子的孝道观	(18)
(3) 曾子的孝道观	(23)
(4) 孟子的孝道观	(28)
(5) 荀子的孝道观	(34)
(6) 《礼记》中的孝道观念	(39)
3. 《孝经》思想评述	(41)

- (1) 孝源于天 (42)
- (2) 孝是伦理的本源 (44)
- (3) 事亲以礼,立身行道 (45)
- (4) 忠孝合一,以孝劝忠 (49)
- (5) 五等之孝 (51)

二 《孝经》的传播和孝道伦理的

历史变迁 (55)

1. “汉以孝治天下”与《孝经》经学地位的确立 ... (56)
 - (1) “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体现 (57)
 - (2) 《孝经》的官方化及其理论的纲常化和神圣化 (64)
 - (3) 父权的膨胀 (73)
2. 魏晋隋唐时期孝伦理的变异 (76)
 - (1) 魏晋的“孝治” (76)
 - (2) 遵守礼法与率性而为 (81)
 - (3) 唐代的忠大于孝 (85)
3. 宋元明清时期《孝经》的传播和孝道的特点 ... (91)
 - (1) 《孝经》的传播和对孝道的重视 (92)
 - (2) 孝道教化的通俗化 (96)
 - (3) 孝道实践的极端化和愚孝 (105)

三 《孝经》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 (113)

1. 传统家庭的历史状况 (115)
2. 父子之礼 (128)
3. 夫妇之礼 (140)

4. 兄弟之礼	(152)
四 《孝经》与传统的丧葬、祭祀之礼	(156)
1. “丧则致其哀”:葬礼中的孝观念	(158)
2. “祭则致其严”:行孝与祭祖	(170)
(1) 周代祭礼的一般含义	(170)
(2) 汉代以后祭礼的社会基础与功能	(175)
五 《孝经》与中国古代法律	(190)
1. 对“不孝”罪的惩处原则	(192)
2. “亲亲相隐”的合法化	(201)
3. 亲属间的刑罚替代	(206)
4. 血亲复仇的正义性和法律的冲突与统一	(210)
(1) 儒家血亲复仇观与孝道	(210)
(2) 法律文本的限制与司法实践的认同	(218)
(3) 义法并立的理论探讨	(229)
六 《孝经》与传统君臣关系	(233)
1. 君父一体,事君如事父,事君重于事父	(233)
2. 主尊臣卑的永恒性	(248)
3. 死谏与愚忠	(254)
七 《孝经》与中国国民性	(264)
1. 仁恕敦厚的群体意识	(266)
2. 重礼守法的行为准则	(271)
3. 忠君爱国的民族精神	(279)

4. 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	(285)
5. 因循守旧的惰性心理	(291)
6. 权利缺失的自我意识	(299)
结束语:《孝经》、孝道与当代中国社会 ...	(304)
附录一 《孝经》今译	(311)
开宗明义章第一(311)	天子章第二(312)
诸侯章第三(312)	卿、大夫章第四(313)
士章第五(313)	庶人章第六(314)
三才章第七(314)	孝治章第八(315)
圣治章第九(316)	纪孝行章第十(318)
五刑章第十一(319)	广要道章第十二(319)
广至德章第十三(320)	广扬名章第十四(320)
谏诤章第十五(320)	感应章第十六(321)
事君章第十七(322)	丧亲章第十八(323)
古文《孝经》	(324)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31)

一 《孝经》的成书与思想内容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总计一千八百余字，在儒家经典中字数固然是最少的，就是在所有传世的经史子集各部中，字数大约也是最少的。但是，《孝经》字数虽然很少，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可不小，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刻而广泛。起码从西汉以后的两千余年以来，上自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下迄贩夫走卒、黎民百姓，无不广为传习，推崇有加。无论如何改朝换代，皇帝由谁来做，国家制度有多大的不同，历代帝王要求天下臣民自觉学习《孝经》的要求始终没有变化，刚刚启蒙之孩童要读的第一部书就是《孝经》；饱学之士更是皓首穷经，探讨研究其由来和微言大义，并以各种形式直观地宣传其思想主张。自问世两千余年以来，《孝经》的思想主张已经渗透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国家法律、社会关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无不受其深刻影响，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血液中都渗透着《孝经》的思想因子，铸就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性格特点。那么，《孝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

书？说了些什么内容？对中国文化变迁究竟起了那些作用？原因是什么？如此等等，都值得我们做一番历史的回顾和分析。

1. 《孝经》作者与成书时间

最早记述《孝经》作者的是西汉中期人司马迁。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曾参事迹时谓“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儿的“作《孝经》”既可解释为孔子作《孝经》授予曾子，也可解作曾子听孔子教诲之后，将师徒对话记录下来而成《孝经》。汉人是按照前一层的意思理解司马迁的记述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谓《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汉代儒生普遍认为《孝经》是孔子所作。但是，《孝经》篇章结构完整，以问答体的行文方式系统地论述孝的理论，和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的文风有异，其表述的思想内容和《论语》对孝的阐释也有不合。尤其值得怀疑的是其第一章《开宗明义章》对孔子的称谓：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

仲尼是孔子之字；曾子即曾参，是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曾子是对曾参的尊称。从称谓上看，无论是曾参记述他们师徒二人的问答还是孔子手作，都不应该称孔子之字而尊称曾参为曾子。所以后人对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自然表示怀疑而另行判断，做出种种推断。主要有曾子门人或者孔子门人说，宋朝学者多主此说，如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序》谓“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谓之《孝经》”。胡寅则谓是曾子门人所

作,云“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这儿的“门弟子”是指曾参的学生。朱熹则认为是齐鲁地区的儒生所作,把《孝经》十八章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所谓“经”即孔子所作的正文,“传”是后人对“经”的发挥。朱熹说:“《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处。”(以上具见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二)这些也都是推断,所以到清朝,姚际恒《古今伪经考》说“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无论是“齐鲁陋儒”还是“汉儒”为之而题名孔子,自然是伪书了。特别是姚际恒的《古今伪经考》问世以后,到近代辨伪之学兴起,《孝经》曾被视为伪书。但在社会上一般读者的心目中,仍然把《孝经》看做孔子之书,有的则直接尊为孔子的千古圣书。

其实,在先秦时代特别是春秋以前,人们没有后代的著书意识,所谓的著作也就是讲述,人们把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就成了著作。如《论语》就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和学生们的日常谈话。《孝经》记载的是孔子向曾参讲述孝道的内容,从《论语》所记孔子论孝的内容看,《孝经》与其有一致之处,起码有一部分内容是孔子的主张。但是,孔子讲学,是随问而发,学生问到什么问题,就根据学生的具体接受能力和个性特点对同一问题给予不同的解答,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因材施教,从没有系统地就专门一个问题长篇大论。当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在当时的谈话过程和内容是否就如我们现在在《论语》所见到的样子,不得而知。也许当时谈话问答的内容比现在我们见到的多得多,只是记录的比较少而已,但我们理解孔子的思想只能以所见到的内容为依据。所以,《孝经》的内容有孔